

出土文献与秦国文学

倪晋波 著



文物

出土文献与秦国文学

倪晋波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出土文献与秦国文学 / 倪晋波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010 - 4475 - 7

I. ①出… II. ①倪… III. ①中国文学 - 古典文学研究 - 春秋战国时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6923 号

出土文献与秦国文学

编 著: 倪晋波

责任编辑: 许海意

封面设计: 程星涛

责任印制: 张道奇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印: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75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0 - 4475 - 7

定 价: 58.00 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扬州大学汉语言文学）
阶段性成果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人

序

倪晋波博士力作《出土文献与秦国文学》即将出版，嘱为序。我好读书而不求甚解，以先睹为快。读毕，思绪兴发，说几点感想以代序。

忆昔与晋波君在复旦大学研究院共同切磋、相互交流而其乐融融的学习生活，许多场景细节犹历历在目。但是时光流逝，快如奔马，十余年曾未若一瞬。当年一米八十个头、年轻英俊却稚气未脱的学生，转眼已步入“三十而立”后的盛壮之境，迅速成为一位朴实稳健而学有专长的后起之秀，颇为引人注目。我外出参加海内外学术活动时，常得友人告之，其学术反响甚佳，将来是个人才。当然，类似夸赞，大多是学界前辈对于年青学者的关心帮助和提携培养；但同时也证明了晋波本人的刻苦勤奋和善于思考。一个可造的年轻人，是不会辜负前辈师长们培植栋梁的良苦用心的。《出土文献与秦国文学》的出版，正是晋波向关心自己成长的前辈们的汇报。汇报是否及格，抑或优秀，有待实践的检验。

《出土文献与秦国文学》既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晶，同时也是作者在学术路上跨出的重要一步，他以顽强的毅力，一步一步地逐渐接近了那庄严肃穆的学术殿堂。十年磨一剑，对青年学者来说，确实不易。

晋波选择先秦文化学术作为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并准备付出更多的心血奉献。研习中国传统学术，先秦是根源，是基础。但学习先秦文化，并非易事，单是那艰深的语言文字关，就让许多年轻人难跨门槛，从而产生了知难而退的心理。但是晋波反之，他是迎难而上，只问学术需要，而不问其他，什么代价、什么效益，都顾不上。这在今天，不说“另类”，也是罕见。他选择出土文献与秦国文学的历史发展这一课题，我也曾提醒他，这既是一个具有开

拓意义的诱人项目，同时又是个艰深厚重的跨学科的全新学术领域，要求研究者必须先突破以前单科独进而不及其余的苏联学术模式，必须具有多学科的综合素养，才有条件完成这一课题。就题目所示，晋波所学为古典文学专业，秦国文学是当然的研究对象；但考古学与文学并重，考古学中，另有洞天，对门外汉来说，又知道了解多少？这就要求晋波要为此付出比一般学人多上几倍的努力。而且，除了考古学及出土文献的整理辨识之外，一旦深入课题中，就会发现，其广袤的学术领域，广泛涉及了历史学、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文学地理）、民族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古文字学、音韵训诂之学，当然还包括经学中的礼仪礼制之学，就是那令年轻人头痛的甲骨卜辞、钟鼎铭刻专门之学，也是无计相回避。比如论述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文学，怎能避开太公庙秦公钟、罍铭刻呢？又如《石鼓文》，虽因年久残缺，但它乃是秦国诗歌的一代杰作，怎能不讲呢？但是秦公钟罍及《石鼓文》，辨识考察，必须花费许多心血，从借鉴前贤成果，到最后形成自己的认识判断和现代反思，步步深入，又谈何容易！但可贵的是，晋波没有后退，而是直面困难，早有心理准备。他尝试着跳进了自己的学术盲区大海中，勇敢游泳摸索，从无知到有所知，搬掉了一个又一个的学术障碍，坚定地踏实了每一前进的步伐，毅然前行，终于努力没有白费，化为心血结晶奉献读者，嘉惠学林。如果没有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决心，没有反复钻研修改的苦功，成果是出不来的。在治学路上，晋波与那追名逐利讲究效益的浮躁学风，大相径庭，两两相较，雅俗分明，高低立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界后继有人的光明希望。

在构建指导自己的学术观念及与之相适应的治学方法时，虽然晋波外语水平不错，也曾努力阅读了许多西方学术原典，并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颇受启迪而获益匪浅。但他并未一味效仿西哲，更未投入时下急于自创宏伟学术体系的大潮之中，而是在迈开初始脚步时，就结合我国传统学术实际，认准典型，刻苦锻炼而认真思考。尤其是近代王国维汇合中西学术之后所开创的“二重证据法”（或称“三重证据法”），其钻研刻骨铭心，专心学习而行之不怠。晋波所坚持的是王国维、陈寅恪诸先生所开创的道路，关系到学术现代化的新科学实证之路。虽然学识积累有个过程，初始阶段或不无稚气之处，但他却

具有真诚之心，只要方向正确，方法科学，长期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臻于成熟，最后有力地叩响那沉重的学术殿堂之门。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章《总论》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后来陈寅恪先生又继续总结了王国维学术内容和治学道路，曰：“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獯豻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陈寅恪《王国维先生遗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卷首）陈氏断言，静安先生之学博大精深，其学术观念和治学方法，“可转移一时风气而示来者以轨迹也”（同上）。中的之论，启悟后人。前辈学术大师已为我等晚辈学人指明了途径与方向，先进观念与科学方法的进步，功德无量。在《出土文献与秦国文学》中，晋波凛遵大师明示之途而前行。当然，如果具天才而能空所依傍自创体系一举成功，这也是应该庆贺的；但这在学界，凤毛麟角，实难追随步武。晋波有自知之明，于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艰难跋涉之路，继续沿王、陈诸大师所指方向，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来。他依循“文献清理—宏观阐释—细部缕析”的思路，具体采用“三重比勘法”（篇章内容、相关史料和出土文献）以及文字比较法、归纳统计法等。学术攀登，并无捷径一步登天，而是必须觅径探路，摸索前进而渐近目标。其所著述，正是这一观念与方法的尝试与实践。成功与否，虽尚待检验，但就其主观努力，则应予以肯定。学界增添了年轻血脉的奔腾，更能显示中国学术的活力与希望。

根据事实来论述，形成了有力的证据而令人信服，是该书的又一特点。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作者谨遵古训，没有事实根据的话不说，他反对强不知以为知的

虚骄作态，己所未识，则老实交代而付之阙如。在其论证中，事实很重要，不过，晋波对证据链中的事实，自己有另有深解。其所著述，原是有为而发，针对“秦世不文”的传统说法之误，侃侃而谈，而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破旧立新，必须言之成理，才能令人信服而有所借鉴；而其“理”何在？当然来自持之有故的事实证明，事实俱在，则不辩自明。但是事象纷纭，有真有假；有内在有表象；有可知，有不可知。所谓用事实来说话，并不是罗列事象而加简单比附的功夫，而是必须精心钻研，才能揭开那掩盖在事实表象后面的真实本质。比如《诗经》中《秦风·车邻》曰：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耄。

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

《毛诗序》曰：“《车邻》，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认为这是一首歌颂性的欢乐歌。但是，有人反之，认为是“反映秦君腐朽生活和思想”而及时行乐的没落情调。晋波则另有见解，认为是一首“君臣宴饮”之诗。但与《小雅》中宴饮诗的歌颂功德不同，《车邻》则因其具体的民族发展历史不同，诗旨迥异其趣：“该诗看起来强调的是‘今者不乐，逝者其耄’、‘今者不乐，逝者其亡’的及时行乐思想。君臣欢宴之上，高歌及时行乐，这实际上是秦人在长期而残酷的军事斗争中积淀的一种思想意识。秦民族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与周边各种势力不断战斗的现实，谁也不知道今日欢宴之后，明天还能否见到日出。……该诗初读之以为快意盎然，文笔轻松，实则道出了一个民族的浴血奋斗史，蕴藉悲怆。”所论精深而辩证，从具体的民族历史生活和地理环境出发，高屋建瓴，道破了轻松快意表象中所蕴藏的悲怆精神，解释了秦民族悲壮史诗的真实内涵。只有真正深入一层地揭示了隐藏在事象背后的真相本质，才能给人以有益启迪。

当然，此书优点难以一一罗列。如作者学术态度谨严，即使是小注也一丝不苟，认真按规范体式加以说明。如论商鞅变法对秦文学的

影响，谈到秦《诅楚文》与晋《吕相绝秦书》之辞，虽然二文性质不同，“《吕》是外交文书，而《诅》则是战前祝文”。但作者经细加比对，同意前贤所称“前者是（按：指《诅》文）仿自后者（按：指《吕》文）”，并加详注曰：“两文在某些用语、语气上的确非常接近甚至相同。如《吕》文开头：‘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诅》文开头与之极其相似：‘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寔戮力同心，两邦若一，绊以昏姻，衿以齐盟。’又如，《吕》文历数秦之恶云：‘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淆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诅》文有类似语句：‘率诸侯之兵以临加我，欲划伐我社稷，伐灭我百姓，取我边城……’《吕相绝秦书》是外交文书，送达秦国后，秦人理应保存。惠文王时代的宗祝完全有可能见过该书，并仿其文。”其比对细致，推理合乎逻辑，因而有助于正文论断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小注尚且如此用心，遑论正篇之论。

总之，此书出版后，其精粗客观存在，相信广大读者开卷有益，自能明辨。以上体会，当否？愿大家来评说赐教。

蒋 凡

2015年6月于上海半万斋

目 录

第一章 “暴秦”与“秦世不文”	1
第一节 “THINA”与“暴秦”	1
第二节 “秦世不文”论及其影响	4
第二章 出土文献与秦国文学研究的可能	10
第一节 秦国文学资料的新发现	10
第二节 “秦国文学”释义	13
第三节 秦国文学研究的现状	15
第四节 秦国文学研究的思路与意义	31
第三章 秦国出土文献年代综考	33
第一节 秦国出土文献对象及其年代问题	33
第二节 从秦系文字发展史判定诸铭刻的年代序列	44
第三节 从礼乐背景、铭史互证等角度考察诸铭刻的镌写年代	55
第四章 秦国传世文献年代综考	88
第一节 《诗经·秦风》年代考	88
第二节 《秦誓》作年辨惑	95
第三节 《吕氏春秋》成书年代异说平议	101
第五章 秦国文学史年表	115
第六章 秦文化与秦嬴文化精神	121
第一节 秦民族与秦文化的渊源	121
第二节 秦文化的地理背景、考古发现及其阐释	125
第七章 文化接触、华夏认同与春秋时期秦文学的发生	130
第一节 《秦风·无衣》：周秦文化接触与秦国文学的萌芽	130
第二节 《秦记》：秦文化的自立与秦国文学的肇始	135
第三节 《秦风》等：秦人的“诸夏”意识及其文学经典的诞生	145

第四节 春秋秦国文学：西周礼乐文化的最后回响	163
第八章 礼乐倾圮、功利意识与战国早中期秦文学的凋零	168
第一节 变动的世界与秦国的危机	168
第二节 商鞅变法对秦文化及文学的影响	170
第九章 文化融合、学史教育与战国后期秦文学的新变	185
第一节 将定于一的战国大势与和秦国文化的多元融汇	185
第二节 学史制度对秦国文学的促进	190
第三节 秦人的宗教信仰与秦文学	193
第十章 “秦诗”的思想意涵与艺术风貌	198
第一节 “秦诗”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	199
第二节 “秦诗”的艺术表现和审美特征	209
第十一章 “秦声”的存在形态与文史价值	216
第一节 “秦声”的留存篇目和《戾戾歌》的原初形态	216
第二节 《口赋谣》、《樗里谚》、《惠文王谚》的 历史价值	221
第十二章 《吕氏春秋》的文艺思想与寓言成就	225
第一节 《吕氏春秋》的文艺观	225
第二节 《吕氏春秋》中的寓言故事	234
第十三章 秦国简牍文献的文学价值	261
第一节 放简《墓主记》与志怪小说的起源	261
第二节 睡简《成相篇》的文学史意义	267
第三节 睡虎地秦墓木牍家书的情感内蕴及其价值	274
第四节 睡简《日书·诘篇》的文体及其民间性	277
第五节 睡简《日书》之《梦篇》、《马徕篇》的 文学价值	283
第六节 秦简《日书》中的神话传说	286
第十四章 秦国文学与古典文学史的叙写	290
第一节 秦国文学的历史嬗迁及其意义	290
第二节 出土文献文学史价值的辩证思考	293
参考文献	297
后 记	314

第一章 “暴秦”与“秦世不文”

第一节 “THINA”与“暴秦”

公元 30 ~ 230 年的某个时候，一位住在埃及的希腊商人据其航行波斯湾和印度半岛等地的经历，写下了一部书，名为 *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厄立特里亚航海指南》），^① 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Beyond this region, by now at the northernmost point, where the sea ends somewhere on the outer fringe, there is a very great inland city called Thina from which silk floss, yarn and cloth are shipped by land via Bactria to Barygaza and via the Ganges River back to Limyrikê. It is not easy to get to this Thina; for rarely do people come from it; and only a few. The area lies right under the Ursa Minor and, it is said, is contiguous with the parts of the Pontus and the Caspian Sea where these parts turn off, near where Lake Maeotis, along with [sc. the Caspian] empties into the ocean.^②（笔者译：越过克利斯国，在最北部海的外缘国家，其内陆有个极大的城市叫秦，那里出产的生丝、丝线和绢布由陆路经巴克特里亚运至婆卢羯车，也经恒河运至里姆利亚。要到秦很不容易，因为来自那里的人极少，很罕见。秦恰处小熊星座之下，据说其边境紧邻本都和里海对岸，靠近麦奥提斯

① 关于 *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的成书年代，争议颇多，本书依 Lionel Casson 所言而论。详参氏著 *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Text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厄立特里亚航海指南：文本、引介、翻译与评论》）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5 ~ 10.

② Lionel Casson: *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Text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91.

湖，可通达大洋。^①)

此间提到的“Thina”（秦），就是后来的“China”（中国），这是“秦/中国”在目前可见的欧洲文献中的首次亮相，^② 时值中国历史纪年之东汉（25~220年）。由“Thina”而“China”、以“秦”为“中国”，可见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始自于“秦”。对彼时的西方人来说，“秦”是广袤遥远、盛产丝绢的神秘异邦；对当时的东汉人来说，“秦”却是去古未远、当引为鉴的无道前朝。同一时期的人对于同一对象的认知有如此差异，这大约是空间的悬隔所致。历史是由空间和时间造就的，它们犹如经纬线，不仅构筑了关于过往的基本“史实”，亦以其间断性和延续性堆砌了影响未来的诸多“事实”。是故，不惟空间的差异会导致认知的异途，时间的流逝更可造成结论的累积和固化。比如，所谓“暴秦”云云。

从《史记》的记载看，“暴秦”的历史认识肇造于秦末乱世。据《陈涉世家》，“伐无道，诛暴秦”^③ 是当时反秦的政治口号之一。刘邦即皇帝位时，下诏封赏部下的理由之一便是“诛暴秦”。^④ 而在战国时

① 开头的“this region”，指前文提到的 Chryse，克利斯国，在今缅甸和马来半岛；Thina，有的英文译本写作 Thinae；Bactria，巴克特里亚王国，即中国史书通称的“大夏”；Limyrikê，在今南印度科罗曼德海岸；the Pontus，本都，黑海南岸古王国；Lake Maeotis，麦奥提斯湖，指 Sea of Azov（亚速海）。

② 此系 J. Needham 在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中国的科学与文明》，Cambridge, 1954）一书中所论。Lionel Casson 在 *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Text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一书中引其言：“Thina: This is the earliest occurrence of the name. Ptolemy speaks at one point of ‘Sinai or Thinai, the metropolis’, but the elsewhere reserves Sinai for the name of the country. Both forms apparently derive, by the way of Sanskrit, from Ch’ in, the name of the great dynasty (221 B. C. – 206 B. C.) the unified China.”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38)

③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第1952页。本书下引《史记》原文及“三家注”均出该本，若非必要，只记篇名，不再详注。

④ 《汉书·高帝纪（下）》：“诏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参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第53页。本书下引《汉书》原文均出该本，不详注。

代，人们对秦多称之以“虎狼之秦”。^①“虎狼”者，言其军力强悍、蔑弃礼义，如肆虐丛林的野兽也；“暴”者，言其任法重刑、不恤民生也。称其“虎狼”，多因在兼并战争中不敌强秦，内怀畏惧；言之“暴秦”，乃是必须于反抗当权时吁集民意，意在否定。由“虎狼秦”而“暴秦”，认知随时势而变。

战国时代的秦，除了有“虎狼”之称外，还被目之以“夷狄”。这种认知在春秋时代便已出现。那个时候，秦人刚刚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公元前771年春，风雨飘摇中的西周王朝遭遇致命一击：犬戎部族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继立的周平王不得不于次年率部东迁洛邑。绚丽的王朝岁月从此零落成只待追忆的黄花，而宗周的“斯文”则幻化为夫子朝歌夜梦一生的传奇。但历史宛似一个舞台，在有人黯然谢幕的同时必然有人粉墨登场。《史记·秦本纪》载：

（秦襄公）七年春，……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畴。

秦嬴，这个长期偏居西陲、与戎杂处的部族，抓住西戎祸周的历史机遇，以“勤王”的行动获得“诸侯”的封号，从而成为与东方各国平起平坐的“秦国”。但是，当时的东方诸国对这个新生的国家其实并不感兴趣，即使是秦襄公主动“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它们仍将其视为与华夏有别的戎狄外族。直到战国时代，“戎狄秦”的意识依然牢牢占据着中原士人的心。《战国策·魏策三》记朱己说魏王之言云：“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

^① 《战国策·魏策一·苏子为赵合纵说魏王》：“然横人谋王，外交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国患，不被其祸。”又，《赵策三·秦攻赵于长平》：“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参见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787、696页。本书下引《战国策》原文均出该本，不详注。

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将秦归于戎狄一族，甚至斥为“禽兽”，偏见不可谓不深。

秦襄公始国之日正值春秋战国拉开大幕之时。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与戎狄同俗的蕞尔小邦在此后的五个半世纪（秦襄公八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770～前221年）间竟成长为令人生畏的“虎狼之秦”，并最终荡平诸强，一统海内，建立亘古未有之大秦帝国。更令人惊愕的是，仅仅又过了十五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至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21～前207年），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便在一群绝望的农民的打击下轰然倾圮。五百五十年的成长路和十五年的掘墓史，是秦帝国命运的两极，其间的巨大反差让后代的士人坚信繁法严刑、使民酷烈是其速亡的主因。汉初学者反思秦政，陆贾、贾谊和晁错等人都激烈地批评秦王朝的酷法苛政。“暴秦”也因此从一个口号变成一种符号。

由“夷狄秦”而“虎狼秦”而“暴秦”，春秋以降的认知慢慢累积，最终成为无需再证的历史“事实”，不断地呈现在后人眼前。明人杨慎有专文《秦之恶》，云：

秦之恶，天下之所同恶也。故曰强秦，言其不听也；曰暴秦，甚矣；曰慢秦，言其无礼义也；曰孤秦，言天下所不与也；曰犷秦，以犬况之也，抑又甚矣；曰无义秦，曰无道秦，恶之至矣、尽矣！^①

此可谓千百年来对秦恶评之集大成，也是关于秦人糟糕的历史形象的经典表述。

第二节 “秦世不文”论及其影响

当“暴秦”成为历史的主流意识，人们便粗暴地以诸如“暴秦不足言”之类的话语来表示对秦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不屑。早在汉武帝时代，司马迁就注意到这种简单轻率的认知倾向，并对其进行了批

^① [明] 杨慎：《秦之恶》，《升庵全集》卷48，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3月初版，第527页。

评。《史记·六国年表》论赞谓：“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不幸的是，太史公的冷静卓识并未指引后人从愤怒的泥淖中清理出一片理性净土。不察始终，举而笑秦，正是历代学者对秦人及其历史最具代表性的态度之一。在文化层面上，这种轻视更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蔑弃古典的历史记录而演变成具有普遍性的愤激情绪。有论者总结道：“自汉而降，仅据焚书一事而不考其实，殊非持平之论。……后世一言及秦，必痛诋之。”^①“痛诋”的结果之一就是印象式的概括来取代严肃的历史文化批评。袁葆镛先生说：“秦者，历史上一大关捩，所宜详加研治者也。而后世不睹其震古烁今之所由，徒见其亡之忽焉，于是诋议备至，文章语谈，资为龟鉴。其始或出于一时之作用，积久竟成传统之观念！”^②这些“传统之观念”中自然也包括了对“秦之文学”的认识。

关于秦之文学，较早也最广为人知的结论是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提出的“秦世不文”论。^③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刘勰前后五次论及秦文学。其中，三处是散论，即：“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明诗》）、“秦政刻文，爰颂其德”（《颂赞》）、“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赎，事均夭横，《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乎”（《哀吊》），分别讨论了秦之仙真人诗、石刻文和《秦风·黄鸟》；余下两处则是概论。《时序》云：“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刘勰比较了战国七雄的文学成就，认为只有齐、楚两国可观，其余则不足论，尤其秦人，因拘于法家之威，几无文学。与这一结论相表里的就是他在《诠赋》中的总结：“秦世不文，颇有杂赋。”

考诸载籍^④，秦世的文学作品主要有以下五类：

① 孙德谦：《秦记图籍考》，《学衡》第三十期，1924年，第13页。

② 袁葆镛：《秦辨》，《国专月刊》第三卷第三号，1936年，第54页。

③ [南朝]刘勰著、王利器校证：《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49页。本书下引《文心雕龙》原文，皆出此本，不详注。

④ 据孙德谦先生《秦记图籍考》，秦代所藏图书载籍名目可考有：《易》、《秦誓》、《尚书》、《诗》、《礼》、《礼记》、《周官》、《秦记》、《春秋左氏传》、《战国策》、《奏事》十二篇、《孝经》、《孔子家语》、《仓颉》一篇、《蒙恬笔经》、《秦始皇东巡会稽刻石文》